

4

1991

WENSHIZHISHI

中华书局

文史知识

22





医药学院610 2 01479074

文史知识

1991年第4期

(总第118期)

• 治学之道 • 顺其自然地攀登

周勋初 3

• 文学史百题 • 《西游记》：奇特的精神漫游

刘勇强 11

• 历史百题 • 秦汉的考课制度

马彪 18

诗 一首取譬危险的隐语诗

——古绝句《藁砧今何在》

邹然 24

文 立意高妙、气势雄迈的奇赋

——枚乘《七发》赏析

潘啸龙 25

欣 人生须臾与时空无限

——苏轼《前赤壁赋》主题阐释

张晶 30

赏 智留绝命词 生命写挽歌

——读徐君宝妻《满庭芳》词

韩啸雯 34

• 古代科技漫话(43) •

中国古代犁的发展及其使用

何平和 36

文化史知识 寒食·改火·复活节

庞朴 41

中国古代的茶具

姚伟钧 45

我国最早的楹联

谭蝉雪 49

清宫《春牛芒神图》

李松龄 53

•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4) •

史法和史意

——从形式与内容的审视到思想的剖析

瞿林东 56

人	封建监察制的一个缩影——崔暹	邓奕琦	64
物	立政为民 诗法自然		
春	——尤袤政治、文学思想简析	戈春源	69
秋	正直不阿的学者程廷祚	陈美林	74

• 武侠小说漫谈 •

奇诡玄巧源于道

——新武侠小说生成的文化背景

舒文治 79

• 古代心理诗学(10) •

有限向无限的生成——“含蓄”与“简化性”

童庆炳 84

《三国演义》故事的流传

蒲松龄的审美价值观

刘乃和 91

张光兴 95

• 宗教与人生 • 谈我国民间的观音信仰

孙秋云 101

• 中外文化交流与比较 •

荷兰高罗佩的汉学研究及《狄公案》

李保华 109

• 青年园地 • 漫话古诗文中的蝉

曹海东 114

• 文史研究动态 • 冯梦龙研究六十年

傅承洲 118

• 文史古迹 • 肥城陶山范蠡墓

程兆奎 124

• 读者 • 作者 • 编者 •

关于“阵云”

程晓东 100

《〈左传〉成书年代质疑》的质疑

王伯虎 106

“聊赖”释义辨证

汪维辉 107

• 补白 6 则 • 笔谏(29) 心不在马与心不在焉(33) 黄老思想在宋初(44) 《李后主新传》即将出版(63) 右军左军与泰山泰水(113) 唐代的武举制(127)

春牛芒神图(封二)

我国最早的楹联(封三)

顺其自然地登攀

周勋初



周勋初，1929年生，上海市南汇县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撰有《高适年谱》、《韩非子札记》、《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九歌新考》、《唐语林校证》、《文史探微》等著作多种和论文数十篇。主编了《唐诗大辞典》、《唐人轶事汇编》(即出)。

或许由于自己已经获得了所谓高级职称，东涂西抹地写过几部书，有些朋友见面就称我为“专家”、“学者”，而且过誉为“学识渊博”云云。听到这一类话，我心中就发怵，真是惶恐无地。自惟才疏学浅，虽然滥竽古典文学的讲席已有二三十年，但连各类典籍的基本知识都掌握不周全，又怎敢侈谈学术？但想到为人贵表里如一，不妨坦白一番，让大家进一步了解我。如有年轻的朋友从我跌跌爬爬的经历中可以引出一些教训，能够起一些参照作用的话，也算是我莫大的慰藉。

我在学术上的发展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从本身条件来说，天份不高，体质又差，从十八岁起生严重肺病，一直拖到二十四岁才痊愈。先是卧床三年，入大学后，又长期住疗养宿舍，精力不及中人。从客观条件来讲，生于八年抗战的兵荒马乱之中，小学五年，换了五所学校；中学四年，换了四所学校。休学数年，

跳级三次，很少有一门功课是从头学到底的，这就造成了知识的零碎和贫乏。大学毕业之后，又一直处在极左思潮控制之下，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应付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思路也受到严重的局限，这些对我的发展都有消极的影响。

但我也有一些优点，做事也还认真，总是想方设法把承担的工作做好。这样也就决定了我必然会走上当代那些所谓“光专（？）不红”者的常见道路，作为使用对象，不断奔波劳碌。又因解放之后突击任务不断，我便接二连三地被分配去完成各项紧迫的具体事务。

1954年，我从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前后干了两年半，参加制订《汉字简化方案》的具体工作，实际上只是数数简化字的笔划，制成各种表格。

1956年，国内始行培养副博士研究生制度，导师胡小石先生希望我回校学习，于是又考了回去。胡先生以为治学当从小学入手，讲授《说文解字》与甲骨金文，学了一年之后，反右运动开始，随之又大跃进兴起，体力劳动不断。当时学生又大编教材，先编中国文学史，再编中国文学批评史，实际工作中都少不了我。书也读不下去了，1959年干脆改为助教，先教散文选，后去接替重病在身的罗根泽先生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1964年参加四清运动，转年重操旧业，之后就发生了摧残文化的大革命。我一生的黄金时代，就这么乱哄哄地闹着过去了。

自1971年起，来了一些“任务”，先是江苏省五所高校合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著选读》，我被吸收参加，注释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和斯大林《给高尔基的信》。随后又参加了《辞海》的修订工作，先是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厕身于三结合的队伍，逐条增加阶级分析的内容。打倒“四人帮”后，我又赴上海去完成我校承担的语词部分的定稿工作，并随手将修改过的地方又恢复了过来。

1974年正在修改《辞海》时，忽闻南京大学接受了注释法家著作《韩非子》的任务，自知又要参加新的突击了。果然，随即奉命返

宁投入新的战斗。任务很重，全书的格局要设计，工农兵三结合百十人的庞大队伍要组织，六、七个大组多次交出来的草稿要由我一人修改。具体工作做得不少，但没有资格参与领导工作，于是当时安的衔头叫“顾问”。

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又因形势所迫，改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和唐宋文学史，开设《文心雕龙》等专题课，先后参加了三次高考语文出题，按例共隔离了半年。其后取得了硕士生、博士生导师的资格，承担了学生阅读专书的指导任务。这时我又开设了近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等新课，形势有了根本的变化。

每个人的经历都不相同。我的特点是长期“打杂”，对于那些数十年来精力专注的学者，徒起企羡之情，自知没有这种福份。今天干这事，明天又不知要干什么事，无法掌握命运。很少有完整的时间用在读书上。教过的课中，除中国文学批评史反复讲过四遍，其余都是短兵相接，没有什么备课时间，一声令下，就走上讲堂。想起一些贩卖错误知识的情景来，还不免暗自脸红。

任务多变，不可能获得一个专注的机会，因此承担某一任务时，也不存什么长时期钻研的奢望，好在秉性还不算太懒，有些想法，也不愿随便让它忘掉，于是在突击某一任务将毕，改为从事另一项目时，总是想及时地把一些心得记下来。我的几本书，绝大多数是利用突击任务的空隙，或是利用某一偶然的机缘，侥幸抢出来的。

例如搞《汉字简化方案》时，《中国青年报》来约稿，让我们写一组文章，系统地介绍汉字简化的历史，领导上就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完成两三篇后，报社撤销了计划，只在1956年3月14日发表了《谈谈汉字简化的历史》一文，尽管只有豆腐干那么大，但当时却颇为高兴，这是第一次发表文章。

大学阶段，因健康等原因，功课学得很差，但在四年级时，曾从胡小石师认真地学过《楚辞》。研究生阶段，小石师本想让我作《山海经》方面的研究，后因学习中断，自知以后也难得有机会再搞什么神话传说方面的研究了，于是抓紧时间，把学习《楚辞》

时所想到的一些问题写了下来。当时极左思潮已经很厉害，此书无法出版，到了1986年，才以《九歌新考》一名正式问世。

文化大革命中，我长期被放逐农场，回城之后，百无聊赖。工宣队早下令将千余册“黑书”上缴，因此已与“宣扬封资修”的古典文学脱离关系。1971年底，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书突然出现，系里看着教师也闲得荒，于是组织大家集体学习。因为这书有来头，工宣队倒也允许大家到资料室中去借古书来读，我过去因教学有严格的分工，从未好好地读过唐代文学，翻阅郭著，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只觉得他对高适的批评太苛刻，因为我是个印象，杜甫去四川，穷愁潦倒，是靠朋友高适、严武接济为生的。这时心有疑团，反正无事可做，就找些唐代的书来读，而且尽量地利用这一读书机会，一遇问题就去查书。这样翻了一年多，有关唐代文学的材料，也就写出了一部《高适年谱》。

1974至1976年，我受命出力注释《韩非子》，工作了两年，书已很熟了，有了些新的感想，深知搞法家著作只能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个偶然插曲，为防日后遗忘，也就随手记录了下来。一有空隙，就慢慢组织成文，这样竟然积累成了一部三十万字左右的《韩非子札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又奉命将三结合产生的《韩非子》注释稿改写成一部学术著作，于是又花了半年多时间，增加了校勘等内容，于1982年以《韩非子校注》一名公开出版。

这时，中华书局约我整理《唐语林》一书。此书文献价值甚高，但杂乱异常。我花了两年左右的零星时间，完成了整理工作，日后我担任了本校古籍所的所长，确定本所以唐代文史整理工作为重点，于是又负责主编了《唐人轶事汇编》一书。

1990年11月，江苏五所高等学校负责召开唐代文学第五届年会，并邀请国外及台湾学者一起举行唐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我被推为主要负责人。为此我主编了一部《唐诗大辞典》，内分诗人、体类、著作、名篇、格律、典故、成语、胜迹八类，作为献给会议的一份礼物。还写了五万字的《唐诗文献综述》，系统地介绍研究唐诗的各种基本材料，帮助读者掌握必要的研究手段。

回首往事，只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匆匆跋涉的过客，又像是波浪上一叶飘泛的浮萍，夤缘际会，被冲刷到一些学术课题中去。聊以自慰的是，这些因偶然的机缘而匆促写成的书，承学术界不弃，还大都得到过好评，这就更使自己高兴，但也常因匆遽成书未能尽善而感到汗颜。

我深知自己的学习不足为训，当代学人怕也难得有我这样的经历，但如果有人认为可以从我身上引出什么教训的话，我认为似可注意以下几点：

一个人总是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有时你想研究什么，领导上却安排你干另一件工作，二者发生矛盾时，最好不要太坚持己见，还是干什么，学什么。人的精力有限，白天绝大部分的时间干这样，再挤出时间来干那样，注意力分散，精力不集中，反而会两败俱伤，工作做不好，个人的研究也上不去。结合工作进行研究，顺其自然地进行攀登，既做好工作，又能产生研究成果，身心也容易保持平衡。我情况特殊，任务多变，但在每一阶段还能集中精力做好工作，并且留下一些著作。闲时翻翻，也感到高兴，这不光是敝帚自珍，也有不虚度年华的一份自慰在内。

我国向有文史不分的传统。我在《文史探微》的《后记》中说，我在学习文学作品时，往往连类而及，也相应地读一些史书或哲学著作，“这样做，是希望对古代学术能有更完整的认识。因为在历史上，无论是一种风尚、一个流派、一部著作的形成、发展和变化，都是纷糅交错地呈现出来的，后人当然可以分别从文、史、哲等不同角度作探讨，但若能进行综合的研究，也就可以理解得更全面，更深入”。这里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扩大知识面后，在探讨问题时往往可以取得触类旁通的良好效应。

我在古典文学的各门行当中都做过些尝试，这样做，对于提高自己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手段的能力很有好处。读书偶有所得，就会想到利用哪一种方式表达最为合适。例如整理《唐语林》时，发现其中一个故事即柳程《刘幽求传》的残文，颇欲撰文介绍，但一时又难决定用何种方式表达为佳。后来我写了《柳程〈刘幽求传〉钩

沉》一文，共分三段，首先作资料介绍，中间作文字笺释，最后作理论阐发，这或许也可说是多层次、多角度地进行研究吧，目下学界中人往往从事单项研究，或擅长注释，或擅长赏析，或擅长考证，或擅长发挥；犹如某一专业户，如遇不合自己脾胃的材料，往往视而不见；若是具有多方面的兴趣，并有相应的驾驭能力，则可充分利用所得材料，制作成合适的成品。

从事学术研究，应把“发人之所未发”作为第一要义。假如只是改头换面地抄袭前人的某些观点，或是把许多他人的观点综合一下，或是在前人的结论上再增加几条材料，都算是新创，那又有什么意味？我的几本书，如《九歌新考》中提到的东皇太一为齐地的大神，楚人不能祭祀河伯等，虽系发挥师说而成，但观察问题的角度和论证的方式均不相同，自信前人从未说过，至少可以作为一家之言吧。又如我在写《韩非子札记》时，力求每一篇文章都要有新见，至少要提出一些新的材料，段熙仲先生称赞此书为“篇篇有根据、有心得的学术论文”，恕不敢当，但自信每写一篇札记时，都曾说出若干新的道理来。

因为过去教过批评史，平时我也喜欢读读理论著作，但或许由于师承的缘故吧，接受过一些文献学方面的训练，走的不是跟着某种理论走的路子。写文章时，对征引的材料常作力所能及的搜集和考核，总想从材料中提炼观点，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而不喜标举时行的理论为先导，或者演绎某种先验的结论以成文。因而过去常被加上“学风陈旧”、“观点不行”、“被封建学者俘虏”等恶谥。时移世改，有的文章终被学界承认，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有人著书强调内容第一，对形式则不太注意，这些人往往是不精于著述的门外汉。殊不知形式之于内容，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内容尽佳，形式不好，他人不能欣赏，也是枉然。我在写书时，常在体例上花一番心思。例如《韩非子校注》出版时，为把此书改为学术著作，又增加了校勘、书影、人名索引、历史地图等内容，便利读者。又如我在整理《唐语林》时，除了对每一条文字

注明出处并加以校勘外，还增加了辑佚、援据原书提要、援据原书索引、人名索引等内容，读者称便。整理古书，不能光看作分段、加上新式标点，如果仅限于此，那也太乏味了。我为《唐语林校证》一书写了长达二万字的前言，分析得较透，事后才觉过瘾。读者先读此文，可对《唐语林》及唐宋笔记小说的来龙去脉和优缺点有清晰的了解。再如《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一书，一共二十万字，却要网络上下三千年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变，为此我在“少而精”上花了一番心思。即使是引文，也曾经过推敲，遴选那些最精粹的文字编入。此书在古文论界还能占有一席之地，或许也能说明它具有若干优点吧。

读书的方法，没有什么普遍一致的道理，可以因人而异。有人喜欢做卡片，有人喜欢做眉批，这都可以，无所谓优劣之分。但我觉得应该勤作札记。读书时有些新的想法，应该立即记下，这也是一种灵感，往往稍纵即逝；如不及时记录，也就可能迅速忘却。当然，有时翻看这一记录，会觉得很幼稚，以为原不必记，但有时却会逐步升华，浮想联翩，产生新的心得。如果你在感想之余，再将有关材料逐渐积累，也就会像滚雪球似的，慢慢酝酿成文章。我的《韩非子札记》一书，就是这么产生的；又如我的论文集《文史探微》中所收的十六篇文章大都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主题不断深化，材料不断积累，才逐渐组织成文的。

查资料时，要不嫌烦，尽可能地追个水落石出。记得我写《高适年谱》时，觉得对高适的生平总算一一有了交待，但对高适的家世，仍然一无所知，这对写作年谱来说，总是一种缺憾。当时考虑到书面材料可能已经发掘不出什么东西，我就下定决心，翻阅石刻资料，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也算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吧，翻了好久，终于在《千唐志斋藏石》中发现了一方《大唐前益州成都县尉朱守臣故夫人高氏墓志文》，经与《旧唐书》本传对勘，始知高适乃高宗时名将高侃之后。这一结论已被学术界接受。

写文章时，应该竭尽全力，不能马虎。有一些人，出席学术会议时，往往随手写一点东西充数，这样对他人固然无利，对自

己也没有什么好处。我自知秉性笃钝，在出席大小会议时，总是不敢怠慢，力争递交一篇较为像样的论文，这也是“敬业乐群”的一种表现。假如你在这种场合拿不出像样的东西，那又怎能让人对你作出好的评价？

还有一点，应该抓住一切机会谋求发展。人生在世，总是面临着很多机缘，往何处发展，则很难说，看你是否能把握住它。我与唐代文学本无缘份，当年因读《李白与杜甫》而引起了一点疑问，才产生了《高适年谱》一书，对唐代的史事和文献认真地学习了一番。1978、1979两年中曾到北京图书馆读书，校勘《韩非子》，抓住机会对《高常侍集》也作了校勘。这时始知故宫博物院中藏有季振宜的《唐诗》钞本和胡震亨的《唐音统签》全帙，遂至该处要求阅读，随后就写了《叙〈全唐诗〉成书经过》一文，学术界就以为我对《全唐诗》也颇有研究的了。日后又搞《唐语林》的整理工作，对唐代的笔记小说也就比较熟悉了。接着提出主编《唐人轶事汇编》一书，又主编了一部《唐诗大辞典》，在这领域中越走越远，简直有些一发而不可收了。记得中学阶段读过一篇英文，题目曰《机会》，大意是说，人们总是羡慕他人机会好，自己碰不到好机会，实则每个人的面前都曾出现过好多机会，关键是你有没有能力，如有能力，就把握得住机会；如无能力，只能让机会在眼前滑过。这是很有道理的，我深有感触。因此我认为，年轻的朋友如想在学术上一显身手，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应该提高能力，扎扎实实地干，那么好多机会都将扑面而来。



《西游记》：奇特的精神漫游

刘勇强

·文学史百题·

“寻穷天下无名水，历遍人间不到山”。读《西游记》，常为这种博大胸怀和气魄所激动。试想唐僧师徒，出生入死，降妖伏魔，艰难跋涉于险山恶水之间，是多么令人心驰神往的壮举！在这里，意志时刻面临考验，理想也不再是装饰俗欲的花环。他们有动摇，也有牺牲；有挫折，也有成功。一切悲欢离合都铭刻在追求之中。这真是一次奇特的精神漫游。无论取经四众，还是读者，都在这漫游中经受灵魂被洗礼的痛苦与愉悦，从而领悟人生的真谛。

清人有《后西游记》之作，称唐僧等取回真经，
1 却未得真解，遂使天下以讹传讹，渐失其真，乃有唐半偈等再度西游取真解之举。有趣的是，《西游记》的命运也如此。且不说明清两代儒释道各逞己心的诠释，也不说清末民初的人因厌烦三教附会，而只当其为“玩世”之作。即建国后，就先有诸多政治性主题的争胜，后有哲理性主题的反拨。现在看来，把神魔斗争机械比附现实矛盾固多滞碍难通。而欲将全部情节置于一种抽象哲理的统摄，亦不免削足适履，导致时代特征的虚化。如书中真假猴王故事，既表明“一心可以干万事，两心不可以干一事”的哲理，又通过诸神不辨真伪，互相推诿，讽刺封建社会人妖颠倒、明哲保身的丑恶现象。可见，政治与哲理不能简单抑扬，有所偏废。它们都只能作为全书丰富内涵的一个层面，而无法涵盖整个内容。

要更准确、更全面地把握《西游记》的本质，我以为应充分考虑它形象构成上的特点。作为一部以宗教人物故事为原始素材的艺术神话小说，它不同于一般写实作品恪守自然逻辑，而是以高度象征化、幻想化的手法，达到对社会冲突及文化心理的寓言

性表现。就说大闹天宫吧，历来聚讼纷纭。按“政治说”，它反映了农民起义或人民革命，而实际上孙悟空两次反叛皆因个人蒙受侮辱。抛开前因后果侈谈反抗斗争，殊难令人信服；依“哲理说”，它写的是孙悟空的童蒙顽劣，是必须遏制和改造的“私欲”暴发。这与我们的阅读感受也不相符。因为我们并未觉得孙悟空是无理取闹，而是为天界的狡诈和悟空的遭遇不公而不平，更为他“无一神可挡”的叛逆精神惊喜。

从穆天子瑶池大宴西王母，这一丰盛的酒席似乎从未散过，它成了封建王权美满、和谐的象征。偏偏出了个孙悟空，把个蟠桃盛会搅得“荒荒凉凉，席面残乱”，那一派永远春色溶溶的单调景象才头一次发生令人惊异的变化。说他反皇权，自然是拔高了。但说他冲击、亵渎了维护皇权的封建秩序，则并不算夸张，其间渗透着普通人民对君权至上的轻蔑，渗透着与明中叶以来个性解放思潮相伴而生的不安本份的情绪。不了解这一文化背景，就无法品味一个小小石猴竟使天翻地覆的喜剧底蕴。同时，由于孙悟空破坏了传统的等级森严的统治秩序，遭到了天上地下、佛道诸神的一致围攻，再好不过地表现了儒释道三教在维护“旧规”上的共同性。作者实际上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三教合一的凝缩图式。当然，这里也暴露了作者世界观潜在的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他一方面渲染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热烈场面，对那种英雄气概流露出明显的赞许之意；另一方面，在理智上，他又无法肯定孙悟空的举动，还要以“安天大会”来补偿蟠桃宴。其实，这种矛盾在当时也是普遍的。泰州学派被誉为明中叶进步的思想流派，造成过“非名教之所能羁络”、“掀翻天地”的影响，而在此派弟子中，却流传着其领袖王艮在天塌之际，奋臂托天，“见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的神话。

总之，《西游记》通过闹天宫的幻想情节，把封建中国维护礼法秩序与亵渎、破坏这一秩序的越轨行为之间的矛盾生动地再现出来了。作者没有把闹天宫当作一般的现实政治冲突来写，而是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把握矛盾的实质。这说明，若从整个思想文化

的角度着眼,《西游记》的意义将比我们已经揭示的更丰富。当然,对于一部小说来说,重要的不是它本身积淀了传统文化的内容,而在于它从独特的角度艺术地再现了这种文化及其发展意向。

2 与同时代的小说相比,《西游记》更自觉地以人物为故事情节的中心。作者无意于劝惩,使人物成为某种道德的标本;也不企图跻身史林,让人物因负荷历史的重任而变得无足轻重;当然,更不追求情节表面的吸引力,令人物在哗众取宠中成为精神贫血儿。他以幻想的形式描绘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在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中所显示出的精神风貌。

无论从哪方面看,取经队伍都是作者经过精心提炼而建立的一个富有代表性的群体。孙悟空的机智勇敢、诙谐幽默象征着我们民族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唐僧的坚定虔诚、软弱无能则体现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志行修谨,面对瞬息万变的现实却缺乏应对能力;猪八戒的贪图安逸、眼光如豆又反映出小生产者的保守心理;至于沙和尚的勤恳依顺,也折射着我国人民朴实、善良的品性。能够以一部作品中如此鲜明地概括民族性格的几个重要类型,确实令人钦佩。

最突出的自然是孙悟空。《西游记》彻底改变了孙悟空在以前取经题材作品中作为宗教信徒和神怪形象的性质,使之成为一个体现着社会愿望的真正的英雄。他的“治国祛邪”的救世热忱与本领,顺应了明中叶亟盼英雄的时代召唤。不过,孙悟空的卓犖不群不仅在于他具有非凡的英雄品格,还在于他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正是在后一点上,作者突破了儒家英雄观念及小说塑造英雄的传统模式。有一个例子很典型。当孙悟空去救金圣娘娘时,妖魔讥讽他是替朱紫国为奴。他喝道:“我老孙比那王位还高千倍,他敬之如父母,事之如神明,你怎么说出‘为奴’二字!”(71回)虽然他打的也是“诳上欺君”之徒,却不甘愿以臣仆自居,还要维护自己高傲的人格独立性。他也象《水浒》中的英雄一样,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专救人间灾害”的斗争中去,也带有除暴安良、见义勇为的江湖好汉特点。但与其说是为了“替天行道”或“建功立业”。

毋宁说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正义感和他特有的在斗争中开拓人生、获得无穷乐趣的心理特征。他既肩负着匡世济民的伟大责任，又不断追求着自我的价值，两者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比较起来，后者更引人注目。而这也与明中叶以后的个性解放思潮有着内在的联系。

明中叶以后，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如李贽、袁宏道、徐渭、汤显祖等，明确提出了个性解放的主张，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要求解除强加于人的精神桎梏，认为率性而行才符合自然之道。二、热情肯定被礼法制度轻蔑、压迫的人的尊严。三、对生活持一种“适世”的态度，以自得其乐为人生最高境界。孙悟空身上恰恰也体现了这三方面要求。

首先是他的自由意识。他天生地养，一开始就在精神上超越了宗法制社会对人的种种限制和约束，以后追求的也是“天不收、地不管，自由自在”。为此，他不断反抗神佛对他的羁縻。在整个作品中，孙悟空只有对唐僧、观音才表现了一定的尊重，但当他们合伙给他戴上紧箍儿，他立时就流露出仇恨与反抗意识。直到全书结尾，小说还写到已经成佛的孙悟空仍未消释心头积怨，要把限制过他自由的紧箍儿“打得粉碎”。他关心的并不是什么“大法”，而是他始终渴望的自由。

其次，是他的自尊意识。这一点，小说描写也很充分。他大闹天宫的心理动机是玉帝“这般藐视老孙”，所谓“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在参加取经后，他的心高气盛，傲不为礼也时有流露。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老孙自小儿做好汉，不晓得拜人，就是见了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我也只但唱个喏便罢了”（15回）及至迫于救师降妖的特殊情境，不得不向老怪行礼时，这个铮铮硬汉竟“沮出痛肠”（34回），从反面衬托出他视尊严为生命的刚强精神。

再其次，是他的自娱意识。书中曾借人物之口说孙悟空：“你是人间之喜仙，何闷之有？”（66回）这确实是对孙悟空的一个极妙概括。他总是以降妖伏魔为游戏，必要时连神圣的取经也要让

位于他的这种“要耍”(如68回)。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孙悟空的大部分战斗并未取得胜利,闹天宫的代价是困压五百年,取经路上也屡遭挫折。可是我们从不感到他是一个失败的悲剧英雄,因为在反抗和斗争中,他已经得到了极大乐趣,已经实现了他对自我的追求。

鲁迅曾批评中国传统文化是“侍奉主子的文化”(《老调子已经唱完》),向来缺乏“个人的自大”(《随感录三十八》)。它以群体道德匡束个性自由,提倡谦卑驯服,隐忍退让,导致国民性格普遍缺少一种亢奋、进取的激情。在这样的文化面前,孙悟空是独具魅力的。当然,孙悟空的自我意识还带有本能的特点。他是以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性生命冲动,反抗着传统理性的顽强束缚,而没有把这种冲动提炼为新的、更明确的理性追求。这使他的性格中潜藏着深刻的矛盾。

如果说作者在孙悟空身上更多地凝聚了民族性格的优秀品质,展示了新的时代精神与追求,那么,在猪八戒、唐僧身上,作者就努力发现和表现了民族性格中的消极因素。把人物塑造由单纯的道德层面引向精神品格的层面,这就是《西游记》的真正价值所在。它表现了作者对民族素质的深刻反省,表现了作者希望人的精神境界臻于完美的高度热忱。

3 《西游记》破除了“拘儒”观念和宗教意识的束缚,以自然通脱的趣味化风格和关注现世、肯定人的力量的世俗化倾向,显示出一种健康的,先进的文化意识和审美理想。

众所周知,古代文论强调文学的道德劝戒作用和历史纪实功能,在风格上一向以温柔敦厚、凝重质实为尚。而明中叶以后,“趣”作为基本的审美范畴成了普遍追求的对象,以致有“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的说法(袁无涯刊《水浒》五十三回评语)。《西游记》正是有意突破了传统的功利观念,有意摆脱冬烘俗儒的迂拘固陋和因循的束缚,更主动地追求文学的审美愉悦性。当然,《西游记》并非“游戏之作”,而是如孙悟空所说“笑中有味”的。

首先，作者对当时社会上的种种弊端和丑恶现象的揭露，不是纯客观的再现，而是用艺术的哈哈镜，在貌似随意的点染中，照见其荒谬而又不失其真的丑态，让人们尽情地嘲笑。如猪八戒称朱紫国太监为“奶奶知事”，因为他们“反了阴阳”。虽是打趣之语，却寓含着作者对当时太监专横跋扈的蔑视和嘲讽。孙悟空在车迟国亵渎神像，以尿作圣水赏与妖道品尝，也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社会道士惑君乱国的深恶痛绝。尤可注意的是，《西游记》中还有许多诋君毁圣的描写，既能解颐，亦可刺骨。

其次，在人物塑造方面，《西游记》也多用谐谑之笔。唐僧心诚志坚，又怯弱迂腐。这样一个人却要率领三个顽劣不堪的“妖徒”进行神圣的取经，本身就极富喜剧性。不过，作者并不满足于表面的滑稽可笑，而是着意挖掘人物不同的性格。孙悟空和猪八戒是小说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形象，但他们带给人们的笑声却不相同。孙悟空是以乐观善谑的天性感染读者的，而猪八戒是被嘲笑的。他虽入空门，却处处贪恋尘缘；虽生性愚笨，却常常耍小聪明，弄巧成拙，等等，这种种不协调和矛盾构成了他喜剧性格的基本特征。

同时，作者不是孤立地描写世态和人物的，而是将其贯穿在情节的发展中。因此，作者在构思矛盾冲突时，总是把它的复杂性、曲折性、残酷性转化为变幻莫测的戏剧性。其间虽也悬念迭起，读者却从不感到紧张。这除了对孙悟空广大神通的信赖以外，还因为作者善于以趣笔化解紧张气氛，使读者关心的不是孙悟空能否取胜，而是他如何取胜。

从文化上说，《西游记》还体现了一种世俗化的倾向。这种世俗化首先表现在它对宗教的态度上。它虽是宗教题材的作品，却能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在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宗教文学及叙事模式时，显示出一种更为灵活的态度，注入了作者对世俗生活的体验和知识。那些高高在上的神佛，也被作者拉到了人间，赋予世俗的特点。不但如此，《西游记》还常讥佛讽道，对宗教采取了一定的批判态度。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宗教本身并不是